

#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是如何认知的

□ 江林昌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古文明、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文明，都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态文明”。在这些原生态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古文明，则称为“次生态文明”。如地中海东部的赫梯古文明、腓尼基古文明，是在两河流域古文明与埃及古文明影响下形成的；地中海北部的迈锡尼古文明、希腊古文明，直接受到克里特古文明的影响；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古文明、日本古文明，深受中华古文明的熏陶。这些有因果关系的原生态古文明与次生态古文明形成了文明圈。世界古代史就是在这些文明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因这些文明圈的不同而交流互鉴，使世界文化多元多彩。

##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提出

在世界原生态古文明中，西亚两河流域最早的乌鲁克文明与北非尼罗河流域最早的涅伽达文明，都起源于距今5500年左右。而且，在几代西方学者的努力下，西亚两河流域古文明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等先后发展的古文明都有了完整的年表，埃及古文明从前王朝—早期王朝—古王朝—中王朝—新王朝等相继发展的古文明也有了完整的年表。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史完整年表则是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步建立的。

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凡谈到中华文明史，都强调五千“多”年。这个“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不是随便加的，而是经历了历代学者的艰辛求证，来之不易。

## 从太史公《史记》说起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这些“本纪”以“世系”为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族共主与君王为叙述中心，将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稽起来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他写《史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述往事”，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后“以思来者”。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心至今令人感动，其“鉴往知来”的原则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然而，从年代学角度考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由公元前100年往上逐年推排具体的历史年代，只能排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再往上的《三代史表》，便只有世系而无具体年代了。至于公元前100年之后的年代则有《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等二十四史完整的记载。因此，公元前841年加上公元后的2021年，总共只有2862年。也就是说，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还有前段两千多年的数据不明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这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多年文明史大致包括五帝时代的文明起源与夏商周三代的早期文明发展两个阶段。过去，在《中国通史》《辞海》《新华字典》所附录的“年表”中，有关这两段文明史的年代均不详细，这严重妨碍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全面把握。

## 学术史上的艰难探索

司马迁之后，历代学者一直在探索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具体

年代，研究年代学的方法也一直在创新发展。

司马迁的年代学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记载中的年代资料作排比推算，我们可称之为文献年代学研究。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假如某段年资料失传，那么相关的年代就无法确定。有鉴于此，西汉刘歆在他的《三统历》《世经》中就另创天文学年代推算，即利用天象来确定年代。这就解决了没有直接年资料的年代问题。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刘恕的《通鉴前编》等，则继续“天文年代学研究”的方法，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一些年代作了进一步调整与补充。

由于文献年代学研究与天文年代学研究，都是建立在传世文献资料基础上的，所以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有些学者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古史及相关年代曾经一度表示怀疑。但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等先生仍继续从事“古史新证”工作。

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著名论文，利用河南安阳新出甲骨文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大致可靠，其中小有误差，亦可据甲骨文而得以纠正。到1925年，王国维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其讲义《古史新证》进一步利用青铜铭文资料推断《史记·夏本纪》所载的世系亦大致可靠。王国维开创了利用地下出土文字资料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古史研究新方法，为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中华文明史年代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王国维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利用甲骨文中的天文资料研究殷商王年。如甲骨学家董作宾于1930年代作《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殷历谱》等；同时期的天文学家刘朝阳作有《殷历质疑》《殷末周初日月食考》等。这些可称之为“甲骨文年代学研究”。

新出土的商周青铜铭文也往往记载有王年、月相、干支等资料。于是学者们据此推断商周年代。如刘师培发表《周代吉金月考》，吴其昌出版《金文历朔疏证》，其后又有丁嘯《西周王年与殷世新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等，是为“青铜铭文年代学研究”。

以上研究，都对文明史年代探究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体现了中国学者强烈的民族情怀与高度的学术责任心，值得我们敬重。

## 现代考古学迎来了年代学研究新曙光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年，清华国学院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些工作，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从而使上述传统的年代学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例如，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出土有了明确的地层关系，而相关的地层又可以取样作碳14测年。如果据甲骨文与青铜铭文推算的年月数据与碳14年代数据相吻合，那么其年代结论就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迎来了大发现时代。我们不仅发现了夏商周三代王权都城、宫殿遗址，以及相对应的诸侯方国都邑遗址，而且还有系统完整的佐证资料。司马迁《史记》所载夏商周三代的王权世系，不仅有了甲骨文、青铜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的佐证，而且还可以落实到具体的都城遗址及其测年数据之中。

过去，疑古学者认为五帝时代是神话传说，虚无不可靠。而王国维在

《古史新证》里据神话学理论指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国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王国维之后，蒙文通作《古史甄微》、徐旭生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进一步论证了五帝时代的“历史素地”。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更使得五帝时代的部族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有了对应分析的可能。

就这样，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已获得了科学系统的认识。即在五帝时代，中华文明从各区域同时独立并起， multiline 发展，相互影响；到夏商周三代，中华文明已进入早期发展阶段，并表现为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前15年，国家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先后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首先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两个阶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具体年代进行多学科论证，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如下：

夏代：前2070年—前1600年  
商代：前1600年—前1046年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这是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还对商代后期与整个西周的每位王年作了排定，如，商王武丁为前1250年—前1192年，西周武王为前1046年—前1043年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也作出了如下推断：

前3800年—前3300年：古国时代的初期，文明萌芽  
前3300年—前2500年：古国时代的早期，文明起源  
前2500年—前2000年：古国时代的晚期，文明形成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每个年代学结论的提出，都是多线索、多材料合证的结果。例如，西周王年的论证既有金文历谱的线索，又有青铜器形制、花纹演变的依据，还有地层学、科技测年的支撑；有文献学可信性的印证，更有如“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天文推算。中华文明史的年代学是建立在科学论证基础上的。

## 深远的意义

公元前841年以前的文明史年代空白，现在终于补上了。中华文明史，如果从文明起源早期的前3300年算起，距今已有5300年了；如果从文明萌芽的前3800年算起，则距今已有5800年了。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明史五千“多”年的科学依据，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宣告。

科学论证、庄严宣告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意义是深远的。从学术史角度讲，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论证，表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让世人信服的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中华文明的内涵特色，总结中华文明的一系列规律，建构中华文明的“三大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中国化。

从社会政治角度看，世界上几个原生态古文明中，中华文明同样具有起源的早期性；而且，中华文明是几个原生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

## 从考古看文明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常州人，生长于仕宦之家。少年时代在常州读书，青年时期随父亲仕宦历练，22岁应试中秀才。受父亲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盛宣怀逐渐确立了以兴实务图富强的经世理念，并在协助父亲办理赈灾、盐政等事务中，形成了事必躬亲、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 创办官督商办新式企业

盛宣怀入仕之际，大规模农民运动渐熄，二次鸦片战后和议初成。同时期，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列强凭借条约保障和技术优势，争相在华发展商业，获取高额利润。如在长江和沿海口岸，外国航运企业凭借蒸汽轮船，迅速挤垮传统船运，船民失业，航权受损。许多人认识到，自强不仅要靠兵备和外交，更需要以新型民用工业为基础。盛宣怀对这一现象有深入观察思考，并希望筹办中国的现代轮运业，向洋商争利，以维护国家权益。

1872年4月，盛宣怀向李鸿章提出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建议。在实际运作中，招商局以漕运业务为主，市场竞争的内生动力不足，由此，盛宣怀“官督商办”的主张受到重视。数月后，李鸿章委任盛宣怀重订轮船招商局章程，募集商股，完善管理，拓展市场运输业务。改革经营模式的轮船招商局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成长壮大，1876年还收购了美资轮运企业旗昌公司，改变了洋商轮运企业主导中国的局面。1886年秋，盛宣怀获任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海关监督。他发现当地乡民多以草编出口为业，但草编产品经陆路至烟台口岸成本高昂、速度慢，且受到日本低运费同类产品的挑战。为支持草编业“免为倭商所夺”，盛宣怀试办山东内河航运，降低运输成本，便利商民。此后，盛宣怀又在广东、台湾等地陆续发展内河航运，实现了“收内地通商自主之利”的构想。

电报业是工业革命新兴产业，列强为殖民通商，竞相要求在华发展电报业。起初清政府仅同意在沿海水下设线，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清政府认识到电报重要性，并拟自主发展电报业，由盛宣怀承担具体工作。发展电报业不仅在于通军报、便商民，更能避免列强以铺设电线为借口侵占沿线权益。为此，盛宣怀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积极姿态，克服资金、技术不足等难题，于1880年在天津成立中国电报总局。

盛宣怀坚持官督商办的报局运营模式。为吸引投资，盛宣怀对电报局招股形式、权益等内容，做出详细说明和规定。为培养专业人才，同时开办电报学堂。在盛宣怀主持之下，电报局协调地方，铺设线路，开办业务，三年内即开通苏、浙、闽、粤等省陆地线路和长江沿线、山东沿海等地线路，此后又陆续在东北、西北、西南甚至朝鲜等地架线经营，近代中国的电报产业，由此起步并渐成规模。由于电报局开设前有外国电报公司在沿海铺设海线，并有违规架设岸线现象，盛宣怀以1870年清政府与列强约定的“海线不准上岸”条款为依据，与违规设线的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进行交涉谈判，责成洋商拆除违规线路，并签订齐价合约，维护了国家权益，营建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1893年，全国首家机器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遭受严重火灾，濒临倒闭，盛宣怀作为“救火队员”，赴上海规复织布局。纺织业是重要民族工业和民生工业，盛宣怀希望中国纺织业能实现“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的发展态势。为此，盛宣怀以利商便民为原则，坚持官督商办。在旧局债务偿欠中，先商股后官股，保障旧商利益的同时赢得了新股商信任，重建所需百万两资金两个月内即筹措完成。为突出商办特征，提升企业竞争力，盛宣怀将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并订立周详严格的管理章程，向政府申请机器购置、税收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仅一年时间，布局就成功复产，且织机和产能增加近3倍。此后，华盛总厂在上海、宁波等地又陆续开设8家分厂，民族纺织业在洋布风靡的中国渐有一席之地。

因筹办洋务实业成效显著，经李鸿章荐举，盛宣怀于1892年任天津海关兼海关监督。此后，盛宣怀身居要职，逐渐掌控了轮电纺织等主要洋务实业。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向洋商争利的经营理念，成为盛宣怀的兴办实业之道。

## 获实业之大成

甲午战败后，列强竞相借款给清政府做战争赔偿，并要求开筑路、开矿等权益抵押，以期瓜分中国。盛宣怀临危受命，筑路保权。此时的中国，修筑铁路谈何容易！面对无资金、无材料、无人才的“三无”困境，盛宣怀实施了借洋债、炼钢铁、开学堂等一系列破局纾困举措。

在筹措筑路资金方面，主要有“借洋债”和“招洋股”两种方式。盛宣怀认为，招洋股虽然方便操作，但是可能导致“初则借路獲利，终必因路割地”的局面。借款自造虽然成本高，但“债虽洋债，路是华路”，能最大限度避免争议，保护路权。针对列强竞相攫取路权并划分势力范围，盛宣怀提出“合纵”“牵掣”的匡补应对之策，即由国家主导的铁路总公司修筑干线铁路，由华商筹款建设支线铁路。在筑路举债中，向势力范围外有利益冲突的列强借款，从而抵制列强争夺路权，以收制衡之效。

筑路以钢铁为原料，而炼钢需要开掘煤矿矿藏，矿产又需以铁路运输，三者密切相关。在筑路保权之外，盛宣怀进一步筹划用本国生产的筑路材料，避免“厂购洋焦、路购洋轨”。为此，盛宣怀接手了当时负债累累的汉阳铁厂，努力改善铁厂经营。当时铁厂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煤炭短缺，盛宣怀秉持民族企业经营立场，赴江西、湖南等地努力遴选合格煤炭，尽可能不购买洋煤。

生产原料得到保障后，盛宣怀面向朝臣呼吁，中国大患是洋人占华人之利，希望各制造局“均购用自家之铁”。铁路、钢铁等行业开支巨大、收效缓慢，尤其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1896年，盛宣怀正式上奏朝廷请求开办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当时不仅列强依托本国银行投资牟利，不希望中国自建银行，清政府内部认识也不一致，对办银行处处掣肘。但是盛宣怀坚忍力持，特别是通过吸纳官本等方式，以争取更多官方支持。1897年，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克服重重阻力，在上海开办，此后，又陆续在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新式银行对于筹办铁路和实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发展新式教育

“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是洋务派的共识。盛宣怀亦始终将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放在重要位置。甲午战后，盛宣怀总结前期办学经验，创行新式教育体系，以培养新型人才。

1895年9月，盛宣怀制定《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经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后，在天津创办北洋学堂，盛宣怀任督学，这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盛宣怀为推动学校建设煞费苦心，先是筹资赎回海河西岸博文书院作为校舍，又从他掌管的财政税收及电政收入中每年提取捐银五万余两作为办学经费，维持学校运营。盛宣怀认为“头等学堂，以选延教习、挑取学生两端最为紧要”，不惜重金聘请洋教师，严格挑选学生，为学堂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北洋学堂初见成效，盛宣怀即着手筹办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这时盛宣怀进一步认识到新式教育的系统性，特别是师范教育和政法、商业等社科人才的重要性。在实际办学中，南洋公学仿行日本师范学校模式，设立中学、上院，办学开支仍由盛宣怀从实业经营中协调筹措。盛宣怀还为学生设计了公费留学、从事洋务等发展道路，以保证其专注新学。南洋公学在稳步发展中逐渐成为集师范、中小学和译书院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学堂。

## 履行社会责任

无论是秉持传统士大夫经世理念，还是履行现代企业家社会责任，盛宣怀始终本着“为生民立命”的济世情怀，并以慈善赈济为事业，而救济苍生的实效，也推动他仕途与实业建设的不断成功。

# 盛宣怀：开办实业以商兴学

□ 狄鸿旭

1871年永定河决口，百余州县受灾，初入李鸿章幕府的盛宣怀，筹措善款，办理棉衣、米粮助赈，收效显著。1876—1879年，华北多地爆发史称“丁戊奇荒”的罕见旱灾，时在湖北主持大冶矿务的盛宣怀奉调天津筹办河间赈灾事宜。盛宣怀不辞辛劳，亲力亲为，“每躬自巡行郛落，风日徒步，按户抽查”，同时带头倡捐，筹措物资。因赈灾成效显著，盛宣怀随即署任河间兵备道，一年后又任电报总局总办。虽工作调整，但盛宣怀仍关心灾情，先后募集善款数十万两，并筹建广仁堂、设立戒烟局等慈善机构。

庚子后十年间，灾荒频发，民穷财尽，筹集善款越发困难。虽然面临诸多掣肘，但遇有灾情，盛宣怀仍义不容辞地担负赈灾责任。日俄战争爆发时，灾疫肆虐，上海绅商及外国人士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开展慈善救济。但是这一组织主要由外国人掌控，工作不便开展，官绅多希望筹建本国红十字会组织，以开展持续性赈灾。盛宣怀为此多方奔走呼吁，在他的奏请下，中国红十字会得以建立和运转。临终之时，盛宣怀立遗嘱用遗产四成设愚斋义庄，继续广行善举。盛宣怀自述“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赈灾一事”，这并非夸张之词，而是他践行社会责任的真实写照。

历史人物自应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中分析。在晚清时代变局中，盛宣怀从国家利益出发，向洋商争利，开创一系列新兴实业，并以商兴学、倾资助赈。这种实业救国的民族情感、经世济民的理念举措，值得后世敬仰和借鉴。岁月无声，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盛宣怀档案有15.7万件之巨，字里行间记录着这位近现代实业奠基人的艰辛付出，也展示着中国开拓现代化道路的苦难辉煌。

